



文化创意： 点亮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光

□ 向 勇

农村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地理形态，现代农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主体力量之一，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不是城市发展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可持续发展路径下的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不是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而是新乡土主义视角下的乡村生态振兴；不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极端解构，而是文化创意赋能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

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的现代性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的全球性发展议程，旨在到2030年在全球消除贫困、保护地球资源、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那些包括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有关挑战的全球议题的回应，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难题，使其转向一条生机勃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第三世界国家贫困加剧、逆全球化、地区冲突、气候情况不断恶化和国际难民问题等全球性危机不断升级的压力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处在一个严峻的关键时期。如今，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完成时间已然过半，但50%以上的目标“进展甚微或一般”，30%的目标“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即便如此，可持续发展依然是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2024年6月28日，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呼吁：“需要大量投资和有效的伙伴关系来推动粮食、能源、社会保护、数字连接等领域的关键转型。”

受资源有限、人口外流、交通不便、生产方式单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乡村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环境建

设方面遭遇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上就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

乡村可持续发展是对乡村高质量生活品质的追求，注重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平衡发展，着力构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乡村可持续发展注重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村落整体营造，积极营造有机、自然、生态、绿色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乡村可持续发展注重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社区综合治理，努力形成村民参与、开放包容的社会治理格局。乡村可持续发展是以村民为主体，以城乡资源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城乡价值共生为路径，协调“守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和旅乡人”等多元发展力量，积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乡村发展机制。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组成部分，关注乡村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创意赋能乡村振兴，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地方感资源：乡村振兴的開發性对象

现代意义的农村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数据。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重塑了农业生产力的劳动主体、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使得以数字劳动素养为代表的新型农民成为农村地区的“新农人”，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工具成为农村地区的“新农具”，以直播为代表的创意劳动成为农村地区的“新农活”，以农业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资产成为农村地区的“新农资”。农村地区的劳动除了农业种植、渔牧业养殖外，还包括技术加工和文化劳作。乡村的土地不仅是粮食的种植地、家禽的放养地、野味的生长地、农特产品的加工地，更是文化的发源地、手工艺的生活地和民俗的承载地。乡村的劳动

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乡村的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乡村的技术不仅包括农业技术、信息技术，也包括文化技术。乡村的数据不仅有农业生产大数据，也有文化生产大数据。乡村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独具“乡村性”的资源禀赋。乡村性内置于乡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具有一种从静态性向流动性转化的现代性特征，成为融血缘、地缘和文缘认同于一体的意识共同体。乡村性是在乡村地景空间中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感，是一种基于个体主观角度的身心感知，是对乡村空间的情感重构和价值审视。

地方感是乡村性的个体表达和主体觉思的体验重构。地方感体现了人与乡村连接的独特能力。人本地理学家段义孚区分了“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认为“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是可以被测量和量化的物理区域；“地方”是个人或群体赋予特定情感意义的空间，是经过人类活动、体验和记忆所丰富起来的具体场所。地方感是认识地方价值的能力，是建立地方认同的能力。乡村文化资源是构成地方感的重要基础。很多村庄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文化遗产，乡村的历史遗迹、传统习俗、口述传说、自然景观，形塑了人们对于特定乡土地理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地方感吸引了乡村的内部社群和外界社会对乡土资源的关注度，有利于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地方感增强了乡土村落的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有利于激活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有利于乡土人文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地方感资源包括地方性风物、地方性工艺和地方性服务，具体表现为地方农特产品、地方风味美食、地方田园风光、地方节庆会展和地方休闲旅游等地方性业态。

创意性赋能：乡村振兴的共生性路径

地方感资源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生活要素，重塑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从地方感资源的开发

而言，“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就是健全推动“文化创意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特色鲜明、认同感强烈的地方感资源，是培育地方性产品的重要资源，是形成地方品牌的核心要素。

文化创意是以文化资源为对象、以创意思维和技术手段为途径、以意义生产和符号生产为结果的新型创意方式。文化创意具有创新性、跨界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是将人文、艺术、技术与商业整合为一体的创意行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文化创意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包括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艺、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8个重点领域。文化创意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文化引领与产业带动、农民主体与多方参与、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以及科学规划与特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文化创意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起点是地方感资源的保护和乡土人文生活的重建，价值依托是社区共识的激活和社区文创的培育，价值目标是乡土特色产业的发展和人文经济的壮大。文化创意是一道照亮乡村资源开发和地方转型发展的希望之光。文化创意的力量不仅可以激活尘封已久的乡土文化资源和凝滞固化的村民创新创业活力，还能推动地方文化形象的品牌重塑和地方经济的特色培育。文化创意赋能乡村振兴需要经历文化提炼、艺术介入、创意赋能和产业转化的营造过程，需要引导政府、村民、专业人士各自扮演合适的赋能角色，需要打通文化艺术与商业运营之间的价值转化，探索一套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创意长效机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联合教科教文组织乡村创意与可持续发展教席主持人）



《说文解字》说：“泉，水源也。”济南以“泉城”闻名于世，自古就有“泉甲天下”的美誉。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一代又一代先贤志士润濡泉水文化，他们的为官之道、家国情怀，在廉洁文化史上留下了璀璨的泉城文化因子，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现实有着借鉴意义。最近，在泉城济南，一座纪念馆拔地而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建好这座馆，用好这座馆”

张养浩纪念馆坐落於济南市天桥区云锦湖公园西侧，也就是历史记载的云庄附近。该馆建筑面积约4900平方米，建筑风格融合元代特色，采用“一心、三进”式院落空间布局。展厅主要分为一代名臣、为政忠告、散曲大家、水月松风4个篇章，系统展示张养浩生平事迹及文学作品，并通过多媒体沉浸空间、互动画卷等现代展陈方式，集中展示了张养浩的人生经历、为政思想和文学成就。

纪念馆入口朝东，馆中的张养浩雕像巍然矗立，仿佛静静凝视着波澜不惊的云锦湖。走出纪念馆，向西南方向步行不到800米，便是“文忠园”，张养浩的墓就坐落于此。

张养浩，元代政治家、文学家。他生于济南、长于济南，据历史记载，他“以布衣入京，历登极要”，前后为政达30余年，为官清廉自守、颇有建树，在当时便得到朝野众口推崇，称他忠爱笃深，为“一代名臣”。元英宗时期，张养浩辞官回济，隐居云庄，七次拒召不仕。虽想“混迹于仕，甘老云庄”，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不改。1329年，关中大旱，朝廷再次征召张养浩负责赈灾，为救民疾苦，60岁的他散尽家财，毅然赶赴灾区。

西行路上，目睹灾民的悲惨经历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句由此流传于世。张养浩忙于赈灾，积劳成疾，60岁时死于任上，被后世尊为张文忠公。张养浩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氏后人将其遗体接回济南安葬。

张养浩纪念馆中，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静静伫立在《三事忠告》（日本早稻田文库抄藏本）的展品前，似乎在说着什么。笔者上前询问，这位老者感慨：“一直觉得张养浩是我们家乡的骄傲，这样的清廉人物影响力是能够跨越时空的，值得我们铭记。建好这座馆，用好这座馆，很重要啊！”诚哉斯言！

为官一生，恪守公廉之心

纪念馆内，一件件展陈设施，详细讲述了张养浩的一生，也呈现出这位济南先贤的优秀遗产。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流传于世的《三事忠告》。张养浩把自己的为政心得整理成书，分别取名《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后世统称《三事忠告》。《三事忠告》展现了张养浩在坚守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上奉行的为政之德、为政之道和为政之术，是古代为官者的教科书，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库全书》中，《三事忠告》位列“官箴”目下之首。在张养浩纪念馆中，“官箴文化”也作为重要章节被设置在纪念馆的核心位置。“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有警戒、劝谏之意。“官箴”，顾名思义就是从政之警戒、为官之箴言。它是从从政者为箴戒对象，从“为政之德”“为政之术”两大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三事忠告》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成为历代官员涵养为政之德的重要参考，或许就是源自其中所蕴含的

走进济南张养浩纪念馆—— 感受穿越历史的浩然正气

□ 孙世会

丰富实践经验。

在纪念馆中，陈列有多个《三事忠告》的版本。《三事忠告》在明代流传到日本后，多次被刻印、译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政要的必读经典之一。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等政治家都对此书推崇备至。日本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有该书的多个版本。张养浩的事迹在朝鲜半岛也有流传。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鲜密阳府刻印了《牧民忠告》。该府教授文裂在跋文中称赞该书，“于修己治民之道，纤悉备具，诚牧民者之规范”。

“时刻谨记，保有浩然之气”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一座“官箴”碑的碑文，也就是著名的“三十六字官箴”，济南市博物馆现藏有碑文拓片。而关于“三十六字官箴”的内容，也在张养浩纪念馆中占据了一定篇幅。虽然也曾有过隐居拒召不仕，但张养浩的政治生涯依然十分漫长。历经元代数朝，张养浩先后担任过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陕西行台中丞等官职。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凭借其风骨留下了深刻印记。元代史学家苏天爵评价，“其牧民则为贤令尹，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曹则号能臣”。

故乡的山山水水，滋养了张养浩高洁的品格，张养浩也以其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浩然正气”。在张养浩纪念馆的最后一隅，一面巨大的铜镜被置于墙上，两侧分别写道，“于人诚信，于官清正”“休图官禄，休求金玉”。为官，不仅需要一面物理上的铜镜，更需要一面心理上的铜镜。时时刻刻谨记，始终心存仁义礼智，保有“浩然之气”。

走出纪念馆，清风徐来。云锦湖上，水波不兴，恰如一面镜子。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



国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做法

□ 施晓光



“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揭示出教育强国建设的科学规律。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推动本国的改革与发展，是许多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通例做法，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应该采取的基本策略。那么，国外高等教育建设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呢？

在终身学习框架内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21世纪是“学习革命”的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大都在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并以此为原则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基本做法是：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将“公平”“正义”“卓越”“质量”等作为追求最高目标。高等教育不再被视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成了适龄青年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不断完善高等教育宏观结构。世界强国大都建立起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形成了有利于各级各类高校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从而确保其整体系统实现创造性、包容性、公平性和持续性的发展。重视基础研究，科研水平高，综合实力强。在基础研究和基础科学领域，欧美国国家研究型大学独领风骚，一流学科数量遥遥领先，科研发表引领世界潮流。形成全球优秀人才聚集地。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和优秀留学生将欧美国家的研究大学作为学习和工作的理想之地，这样也使得欧美国家科技人才济济，科研后备力量雄厚。

建立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保障机制

高等教育是一个高投入的领域，尤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大量的经费投入，很难生产出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成果，也很难培养出一流的优秀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其一，教育投入是前提。只有高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产出。欧美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发达，主要得益于其在医学领域的高投入。其二，经费来源多渠道。在过去几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公共高等教育投入增速放缓，甚至有下降趋势。一些国家开始实施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PPP）

投资模式，缓解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压力。除了提高学费标准之外，一些国家鼓励私人捐赠、建立科研服务市场等。通过采取PPP方式保障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鼓励私人捐赠，从而捐赠成为大学经费新的来源。2016年，剑桥大学的基金规模达到62.5亿英镑（约合82.2亿美元），稳居英国高校榜首。牛津大学拥有50.69亿英镑的基金（约合66.67亿美元），两所大学的基金规模远远超出英国的其他大学。

积极探索高质量育人模式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重要使命，是高校的第一职能。为了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高等教育强国意识到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促进育人模式变革。一是在教育目标上，将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的任务。例如美国博伊尔委员会出台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指出：大学的使命就是要“造就出一批富有探索精神和渴望解决问题，拥有代表其清晰思维和熟练掌握语言的交流技巧，拥有丰富的多样化的经验的特殊人才”。二是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坚持突出课程体系的研究性、多样化、个性化原则，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平

衡，重视跨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三是在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上，强调一年级探究性学习、以发现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服务性学习、本科生科研等。

重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不仅建立起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也积极推进大学内部组织、权力结构和内部治理模式改革。其具体表现：一是明确大学使命和责任。通过制定大学规划和重新明确办学方向，实现大学转型发展，进而增强大学核心竞争力，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需要。二是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大学内部治理设置教授会、学院制、学部制、导师制、讲座制、同行评价制和岗位长聘制等。三是减少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即通过建立“合法性权威”和“专业权威”两个平行且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合理分配大学内部权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借鉴国际经验有助于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然而，由于我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基本国情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国外的有些做法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切不可照抄照搬。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仍需借鉴国际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